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 看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内蒙古电大 哈 萨

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就是在清王朝覆灭以后,官督商办企业实体没有了,但是它潜在的影响仍很深远。官督商办企业作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儿。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试分析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一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洋务派在棉纺织业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我国的通商口岸就依稀地觉察到外国棉纺织品对手工业纺织品的侵蚀。天津、烟台、营口先后辟为商埠,外国棉纺织品长驱而入华北和西南腹地,到了1885年,棉制品进口数量已经压倒鸦片而跃居进口贸易第一位^①。棉制品进口数量的激增,促使中国家庭纺织副业和城市手工纺织业解体,为致众多的手工业者被迫陷入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

在外国棉纺织品占领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某些与中国买办势力深相勾结的外国资本家,产生了就地利用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直接在华设厂制造的念头。六十年代,上海一些外国洋行不只一次地企图在中国公开招募股份,成立织布公司,这表明外国资本家设法向中国棉纺织业渗透的野心。

中国棉纺织业所发生的这种急剧变化,从洋务大官僚到一般官僚、商人和买办,都有明显的感觉。

以“略分洋商之利”“寓强于富”为主张的洋务派官僚,在同治末、光绪初的“海防条议”中,用开办新式企业作为筹饷来源,以解救清王朝的财政困难这一问题。这期间丁汝昌倡议“设厂造耕织机器”,曾国藩等“奏请开煤铁矿试办招商轮船”

李鸿章更具体提出:“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于中国女工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②此后,李鸿章于1882年、1893年、1894年又屡次提出这些问题。洋务派骨干、天津海关道黎召民(兆棠)也就在这时“再四讽劝”李鸿章创办机器织布局。

商人们对纺织业状况更有切肤之痛。郑观应说:“嗚呼!洋货销流日广,土货运销日艰,有心人能不惘然忧哉!”因此,他认为不能“坐视土布失业”,要“筹一暗收利权之策”,这即是“设洋布厂”^③。

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商人,都有设厂抵制洋货的愿望。但是,他们各自又都没有单独办棉纺织业的力量。

从洋务派官僚方面看,他们没有经济实力创办一个近代棉纺企业。有个事实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876年,李鸿章在黎兆棠的建议下,派魏纶先“出头承办”织布事宜。魏于年初去上海,邀集商人筹议,先由南北洋“筹垫公款十万两,定购机器”,然后“再招商股,购料鸠工”^④。但魏纶先不过是北洋幕僚中一个技术人员,他与江南官场和上海商业社会都很少联系,既未能从南洋博得官款,也无法在上海讨取新旧商人支持。他在招商集股毫无着落的情况下,便于第二年去湖南宝庆为李鸿章勘察煤矿去了^⑤。很显然,洋务派官僚资金不足,急需筹资。

当时商人们固然有办厂的愿望,而且他们是货币财富的拥有者。可是商人们所面临的帝国主义竞争,厘金剥削,封建习惯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所以商人即使投资办厂,也无力仅靠单个企业的力量,抵抗这些强大的阻力。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政治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商人们有心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必须找到奥援和靠山,否则就无更好的出路。

官商各有苦衷：商需要封建政权的荫蔽，以便能够绕过很多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官需要利用私人的工业投资以达到他们“求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正因如此，当1873年彭汝琮提出了筹建机器织布局的建议后，洋务派官僚便一口应允。上海机器织布局便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始了筹建工作。两种不同的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到一起来了。

二

官督商办企业是“以中国之官权，行西周之商法”^⑥。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把资本主义纳入封建主义的轨道或模式，置于封建势力的控制下。这是“中体西用”的具体措施。洋务派既然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引进了企业的内部，而这两者是不可能和平共处在一个统一体内的。物质生产的过程把不同的社会力量集结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联系又有矛盾，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上海机器织布局便是一个典型。该局从1878年筹办之日起，到1893年被焚为止，十五年间，始终存在着“官权”与“商利”的斗争。

宗旨不同，必难水乳。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吸收商股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可因是官督商办便决定了它的经营管理权不掌握在商人股东手里，而是掌握在代表封建政权的官僚手里。企业中的人员黜陟，经营决策，管理方针，资金调拨，盈余分配之权都握在官方所派的“督办”手中。这种不平等的联合，从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从彭汝琮退出织布局说起。1878年彭汝琮向李鸿章和沈葆楨请求奏准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同时委任郑观应为襄办，郑观应不肯居于彭汝琮之下，再三推辞，勉强接受礼委。不久，二人闹翻，结果是彭汝琮退出织布局。这一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简单的郑、彭私人之间争夺地位的结果。因为当时还分裂出去一批以茶商和捐客为主体的出资人。他们“由一个外国洋行协助，企图另行组织一家纱厂”^⑦。所以，这次人事变动实质上是官商之间意见分歧的结果。彭汝琮退出织布局后的改组情形更证明了这一点。因彭走后，筹备工作的实权并没有为郑所得，而是落入戴景冯、吴仲晋、龚寿图等人

手里^⑧。他们都是官僚子弟（戴景冯是松江官绅、翰林院编修戴恒的侄子、吴仲晋的祖父和龚寿图的哥哥都曾任海关道），招股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于是又经历了一次改组，仍是由戴、龚等官场人物出面，由郑观应、经元善代表商方实际主持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经元善。他怀着发展私人资本的要求参与了创办新式企业的活动。他的想法、作法和代表官方势力的戴恒、龚寿图等人的看法有着明显的矛盾。经元善比较注意招徕商股。他为织布局设置了一个登报招集股份的办法：“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开始。”^⑨这种作法，开始突破了帮商亲友的狭隘范围，扩大到以全国主要商业城市的商人作为争取对象。在招股工作中，这种认票不认人的措施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它在资本的周转和流通上起着重大作用。这也适应了各地商人的要求，附股者极为踊跃，甚至超过原来所要招募的数额。在经元善看来，这正是商务“已将萌芽勃发”的气象。但却由此引起了把织布局当作衙门来坐的戴恒、龚寿图的反对。他们不赞成这种公开招股的方式，双方的争执继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道不同不相为谋，终难水乳”。从此后一直到1887年筹办实权落到戴、龚这批官场人物的手里。郑观应虽然担任了商股总办，但和官总龚寿图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中^⑩。商股在企业中的地位显而易见。

官权侵吞商利，卵石无可如何。

官权与商利这对矛盾中，由于有整个封建政权作为“官权”的支柱，所以“官权”始终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官权”具有侵吞“商利”的巨大危险存在。

八十年代初，郑观应便指示：“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商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华商相信洋商。不信官督商办之局，职此故也，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家他日借口。”^⑪所云“公家他日借口”正是反映了他预感到官督商办企业终将在最后为官方所吞并。郑观应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所受的损害以及这家企业的归宿，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这家企业经多次改组，每经一次改组，“官”

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就加深一步。而投资入局的私人资本便蒙受一次损害。

1881年,上海机器织布局集得资本五十万两银时,其中私人资本三十余万两。在企业内占有压倒的优势。1884年郑观应因挪用股票进行投机事发,退出织布局。1887年龚寿图兄弟再度接手。但他们在清理时对初创时投资的商股一律课以七折,官商矛盾趋于尖锐。上海《申报》揭出织布局“在股台冤同人”公启,要求“旧帐揭清”^②。两年后织布局再次改组,一个早期任该局会办的卓培芳又在《申报》上呼吁股东与龚氏兄弟“记算”,要求官方顾全“众商血本”,并号召“上海以外股商来函支持”^③。马建忠接替龚氏兄弟后,李鸿章指拨仁济和保险局款侵入织布局。稍后又由杨宗濂接手,官款更是乘机而入,李鸿章“拨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④,洋务派官僚也陆续投资。1893年经大火焚毁后,织布局规复工作落入盛宣怀之手。经清理,官私款项的比例与初创时大相径庭。官款存银二十六万五千余两,商股在名誉上是五十五万四千余两,但其中真正属于“各省绅商”的股款不过十三万余两,仅占织布局全部资本三分之一^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织布局焚毁后,官方对旧时商股一律以残余物料折价偿还,使那些原初每股投资一百两,后又增资三十两的股东,仅仅领回四十余两的股金^⑥。可见十多年中,织布局的资本构成在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实质则是官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侵吞与排挤。正因为在企业中官方一味“剥股东之权,寒股东之心”,“权与利相因而至,未有事权失而利益大也”^⑦。所以,当盛宣怀规复织布局再筹款时,股商们唯恐“他日办好恐为官夺”,要求“一律商办”^⑧。可见官督商办企业使商人心有余悸,望而却步。

盛宣怀接手织布局规复工作后,李鸿章又全力支持他设计控制全国棉纺织业的计划。即在织布局的旧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官督商办。又把全国纱锭限制在四十万锭,布机五千张的数额上(包括湖北织布局的纱机、布机在内)。“十年之内,不准续添”^⑨。很显然,这项计划是打着官督商办的旗号,保证官僚集团对华盛总厂的全面控制,又用限制全国纱机、布机数量的方法,以排斥官僚集

团之外的民族资本投资,使之无从下手。从此,官督商办的织布局逐从原来商股占优势的局面,转变为李、盛官僚集团牢固控制的私产了。可见官督商办企业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商股,而是代表封建国家的官权。“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有权者与无权者竞,则有权者胜,而无权者负矣。”官权与商利之间形成“卵石之势”,以卵石击,商股的归宿当然是可悲的。这种企业的性质当然不是民族资本,而是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它的出现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引起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结构性变化,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通过剖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商关系,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总结:

第一,官督商办企业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它未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官”(封建主义)对“商”(资本主义)的摧残,它在企业内部鱼肉商股,在外部实行垄断。对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起了严重阻碍作用。梁启超说,官督商办的官权把持使“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也”^⑩。何启、胡礼垣就曾大声疾呼:“独任商人,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⑪

第二,促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对办民族资本产生了新的认识。

投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郑观应最初曾把“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理想化。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后,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曾作一首诗:“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⑫此后,他积极主张无论铁路、轮船、纺织、制造等等各业,应“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股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⑬这是他经营官督商办企业所得的经验教训,同时也代表了中国近代很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他的所谓“民间”是指的真正的民族资本。并认为,这才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道路。

官督商办企业的失败,给民族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的认识有所提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者总是把“民间”与“官督商办”对立起来，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这两者不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事物。因此，必须在他们当中划出一条很清楚的界限。梁启超、薛福成的富国必须富民、藏富于民的思想，是提倡民间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鉴于商权没有保障，民间资本受到戕害，进而要求政治、法律上的改革，实行“变法”，从上层建筑自上而下地保障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他们谴责官督商办，提倡民间资本主义在思想上认识上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且历史证明，没有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经济建设的点滴成就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维新和革命就成为继续前进的方向。

第三，一个事物内部矛盾与斗争，必定会促使这一事物转化或分化。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历史告诉我们，“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权”与“商利”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又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斗争相呼应。其结果引起了官督商办企业本身及其从业人员的分化与转化。有些转化是一目了然的。郑观应由买办转化为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股。杨宗濂兄弟后在无锡设立业勤纱厂，办了一个独立的企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有的转化则比较曲折，例如盛宣怀，他除接手上海机器织布局外，还曾握有招商局、电报局的大权。他攀附李鸿章当上了这些主要官督商办企业中的督办，利用督办所拥有的官权，大肆敛财自肥。他把通过官权聚敛的财富又以其中一部分作为商股投资到这些官督商办企业中，成了这些企业的大商股。所以，到清末，盛宣怀已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物。辛亥革命后，政权更迭，他原所凭借的官权支柱已全面崩溃，盛宣怀本人则遁逃日本。后以公民身份返回上海定居后，仍继续控制招商局与汉冶萍，这时他已不依靠官权而依靠股权了。因此，自辛亥革命以后他已经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官督商办企业与其人员的转化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衰与递变。

注 释：

- ①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导言。
- ②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
- ③参阅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纺织篇》。
- ④同②
- ⑤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 ⑥汪穉卿《论商战》，载《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日（1896年12月14日）。
- ⑦《字林西报》1879年4月2日，《北华捷报》1879年4月4日。
- ⑧《申报》1880年1月15日。
- ⑨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
- ⑩同⑨
- ⑪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第4页。
- ⑫《申报》1888年7月13日。
- ⑬《申报》1890年11月1日。
- ⑭杨寿彬等《杨耦舫行状》，转引自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
- ⑮《新辑时务汇通》卷83，第9—10页，《申报》1893年12月21日。
- ⑯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
- ⑰郑观应《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东签注部批隶部章程附意见书》第42页，光绪元年九月十五日（1909年10月28日）。
- ⑱《盛道来电》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 ⑲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布局折》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书》卷18第10页、第17页。
- ⑳转引自王熙《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 ㉑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诠》三编，第15页。
- ㉒《罗浮俯鹤山人诗草》。
- ㉓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